

在农村的三天

第一天（流浪人）

目前农村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前所未见和前所未闻的事情。在我们的由八十个农户围成的村子里，每天都有六到十二个又冻又饿、衣衬褴褛的过路人来寄居。

这些衣衫褴褛的人几乎是衣不蔽体、不穿鞋袜，全都有病，全身污秽不堪。他们走入村子便去找甲长，而甲长为了这些人不致饿死和冻死在街头，便把他们带到当地的居民家里。甲长只把农民看作是居民，所以既不把他们带到地主家去，虽然在地主家里，除了自己数十间住房外，另有几十间作事务所、车夫房、洗衣房、仆人住的下房和其他作坊，也不带他们到神甫或助祭的家里和商人的家里去，这些人家里的房间虽不算大，却毕竟还有一些空房。而农民，一家人——老婆、儿媳妇、闺女、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生活在一个七八俄尺、上十俄尺的房子里。而当家人却接受这个饥寒交迫、气味难闻、衣衫褴褛、污秽不堪的人，而且不只让他住下，还要供他吃饭。

“你就在桌旁随便坐吧，”当家的老头儿对我说，“不能不把他召来啊，要不心里过不去。”既要给他吃饭也要给他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茶。

这是夜晚的寄居者，然而在白天，去每个农家造访的却不是两个或三个，而是十个和更多的人。一样，“也不能”……

尽管面包还不够分给新来的人，农妇还是分给每人一份，不过，切得多一点或少一点，就因人而异了。

“如果所有人都给的话，那么一天一个大面包也不够，”主人对我说，“下一次就得作孽，拒绝了。”

就这样全俄罗斯天天都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支庞大的、每年都在壮大的乞丐、残疾人、被政府流放的犯人、无依靠的老人，而主要的是失业的工人大军——要生活，要居住，也就是说，要避开寒冷和恶劣天气，并且直接要靠最困难的劳动者，最贫穷的阶层——农村和农民来供养。

我国有工人的育婴院，有社会救济厅，每个城市有各种慈善机关。在所有这些机关里，在大楼里都有电灯、镶木地板和整洁的女佣人，并且有各种不同的享有优厚薪俸的职工，救济几千个各种孤立无援的人。尽管有不少人得到这种救济，但是，就现在日趋贫困、流落全俄的众多人数（这个数字不清楚，大概是很大的）而说，毕竟只是沧海一粟罢了，而且没有任何机关管他们吃饭，只靠农村人民养活他们，只靠基督教的感情促使农民去承担这个巨大而沉重的义务。

只要想一想，那些不是过农民生活的人，假如让他们的每一个卧室都安排一个这样饥寒交迫的、长虱子的、污秽的过路人，哪怕是一周只有一次，他们会怎样发作呢？而农民却不仅给这样的过路人住宿，并且还给他们吃饭，给他们喝茶；因为，“不让他们同桌吃饭，他心里就过不去”。

农民不停地做这种事，也像一切真正的善事一样，并不觉

得这是善事。其实，这件事除了“对心灵来说”是一件好事之外，对全俄罗斯社会来讲，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件事对全俄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假如没有这样的农民，没有强烈地活在他们之中的那种基督教的感情，就很难想像，不但这几十万不幸的无家可归的人会怎么样，而且所有殷实的特别是富有的在农村居住的人会如何。

不过得见到那些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人所陷入或被弄到的贫穷和苦难的程度，并深切地想到他们不能不产生的精神状态，才会知道，只有农民所提的那种帮助，才制止着他们对那些过份地控制着这些不幸者只是为了活命所必需的一切的人使用暴力，而这种暴力在他们的处境下却是完全正常的。

因此，并不是各种慈善社团，也不是政府及其警察与各种司法机关在保护我们免受那些已陷入（主要是被弄得）极度贫困与绝望的流浪的、饥寒交迫的、无家可归的人们的攻击，而仍然是那股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基本力量——农民在保护我们，正像他们养活我们、喂饱我们一样。

是的，如果在广大的俄国农民中没有那种大家亲如兄弟的深厚的宗教意识，那么不管有什么样的警察，这些处于绝境的无家可归的人不仅早就把富人的全部房屋捣毁了，而且把所有挡道的人都杀光了。所以当我们听到或报上看到有人抢劫，或为抢劫去杀人时，需要的不是害怕和感到奇怪，而是要理解并记住，既然这些事件发生得这么少，我们只能感谢农民对这些不幸的流浪者那种无私的帮助。

到我们家来的每天都有十至五十个人。这些人中有的是真正的乞丐，这些人由于某种原因选择了这种求生的方式，自己缝了讨饭袋，穿着衣服、鞋子，尽可能地四处乞讨。这些人中



有瞎子、缺胳膊少腿的，也有少数的小孩与妇女。不过这些都是一小部分，如今大多数的人是不带讨饭袋的过路讨乞者，而且多半是年轻人，而不是残疾者。他们全是可怜巴巴的，没有鞋子衣服穿，面黄饥瘦，冻得发抖。你问他：“到哪里去？”回答差不多是一个样的：“找工作”，或者说，“去找工作没有找到，要回家去。没有工做，四处都关门了。”这些人中间也有不少是从流放地回来的。

这些过路的乞丐有着很多各不相同的本性：有些显然是酒鬼，是酒把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有没文化的人，但也有十足的知识分子，有些人谦恭，觉得不好意思，有些人则相反，死乞白赖，要求太多。

前几天，我刚一醒来，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就跟我说：

“台阶上有五位过路人。”

“把桌子上的钱拿来。”我说。

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拿了钱，按例每人发给五戈比。过了大约一小时，我来到台阶上，一个穿着很褴褛、鞋子破烂不堪的个子很小的人向我鞠躬，并取出一张证书。

“给您钱了吗？”

“伯爵大人，五戈比能起什么用呢？伯爵大人，您理解理解我的处境吧。”他取出一张证书。“请您看看，伯爵大人，请看吧，”他指着自己的衣裳说，“我能到哪里去呢，伯爵大人，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到哪里去呢？”

我说，我给大家都是一样的。他继续央求，让我看他的证书，我拒绝他，他就下跪，我请他离开。

“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该去自杀？好吧，只能如此了。随便什么都行。”

我拿了给他二十戈比，他走了，显然满脸怨恨。

这种特别难缠的人很多，显然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向有钱人索取自己的一份。这些多半都是有文化的人，经常甚至是博学多识的人，而且对这些人来说，发生了革命是不以为怪的。这些人不是像以前的普通乞丐那样，把有钱人当作是用施舍去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认为有钱人是强盗，掠夺者，吸工人血的人。这种人不光自己不工作，千方百计地逃避工作，但用工人的名义，认为自己不但有权而且应当憎恨人民的掠夺者，即有钱人，并需要全力地憎恨他们。如果说他是请求，并不是要求，那也只是假装而已。

关于这种人以及那些酒鬼，我要说，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这些流浪者中也有许多是具有另一种气质的人：温和、谦逊、很可怜，想到这些人的处境就觉得非常可怕。

看，有一个高个子的很漂亮的人，他穿一件破烂的很短的上衣，鞋也穿坏了、磨破了，却有一张聪明的好看的脸，他摘下便帽，像平时一样提出要求。我给他钱，他表示感谢，我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彼得堡来，到农村的家里去（我们的省里）。”

我问他：“为什么要走回去？”

“道来话长，”他耸耸肩膀说。

我请他讲一讲，他就讲了，看样子说的是真话。他说，“我原先住在彼得堡，有一个非常好的办事员的职位，薪俸30卢布。”生活过得好，“我看过您的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他再次微笑着说，笑得十分愉快。

“家里人突然想，”他继续说道，“搬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省去住。”家里人给他回了信，问他是否同意卖掉他名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老地方的那份土地，他答应了，家里人走了。但结果发现，西伯利亚给他们的是很坏的土地。他们在那里住了些日子后又回家去了，现在住在自己乡下的房子里，但没有土地了，靠打工生活。加之在这以前住在彼得堡的生活就已经不好了，已丢掉了最好的职位，而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原因，而是我供职的那个商号破产了，职员们全被解雇了。“说实话，我当时便与一个女裁缝同居了。”他又微笑了一下，“她把我弄得精疲力尽，我要帮助自己人，可现在自己却弄成这副狼狈相。咳，天无绝人之路，或许，能对付过去。”

显然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务实的人，只是由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才使他变成现在这个处境。

或说一说另外一个人：他穿一双破鞋，腰上系着带子，整件衣裳上的窟窿星罗棋布，显然不是撕破的，而是穿得破得不能再破了。一张大颧骨的脸，愉快、聪明而且冷静。我照旧给了他5戈比，他表示感谢。我们进行了交谈，他是一名流放犯，过去住在维亚特卡。那里的情况也不好，如今则是糟透了，正要到梁赞去，他以前在那里住过。我问他：做过什么事？

“贩报的，沿街卖过报。”

“为何事而落难呢？”

“散发非法出版物。”

我们也谈到了革命，我说了我的看法，认为一切在于自己本身，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摧毁这么强大的势力的。

“只有消灭了自身上的恶，才能消灭我们身外的恶。”我说。

“这话不错，那可不容易。”

“要看于我们。”

“我看过您论述革命的书。”

“这不是我的书，但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想求您送给我部分您的书。”

“我很高兴。只是不能把您害了，我给您一些最无害的书吧。”

“我怕什么？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对于我来说，坐牢比现在这样更好，我可不怕坐牢，我正希望再去坐牢呢。”他忧郁地说。

“真可惜，白白浪费那么多气力。”我说道，“看，像您这样的人，生活得多么不协调啊。嗯，您现在怎么样？想做点什么呢？”

“我？”他盯着我的脸说。

涉及过去的一般问题时，他欢快而又迅速地告诉我，而一旦谈及他，并看到我的同情时，他便把脸扭了过去，用袖子挡住眼睛，后脑壳也抖动起来。

有多少这样的人呀！

这样的人不仅可怜，也感动人，不过连这些人也是站在门坎边，一旦越出了这个门坎，他们就将处于绝望的境况，而在这个门坎里，好人将会着手去做一切事情的。

亨利·乔治说过：“不论我们觉得我们的文明社会是如何的稳固，在它里面已经孕育了破坏力量。不是在荒野与森林里，而是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和大路上培养着野蛮人，他们对文明将要做的只是匈奴与汪达尔人对古人所做的那种事。”

是的，二十年前亨利·乔治所预言的这件事如今在我们的眼前到处都发生了，而在我们俄国更是十分明显，这是由于政



府在奇怪的受惊状态下，极力地暗中破坏了那些已有的或可能有的一切公用事业的基础。

在我国，在俄罗斯，乔治所预言的汪达尔人，已全部准备好了，并且他们，这些野蛮人，这些不可救药的人在我国，在我们有着深厚宗教信仰的人民中间（不管这好像是多么奇怪）十分可怕。这些野蛮人在我国之所以十分可怕，是因为我们没有欧洲人那种强有力的忍耐的素质，遵守礼节与社会舆论的因素。斯杰潘·拉辛、普加乔夫……而且讲来可怕，这支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大军，由于我国政府的那种也和普加乔夫同样的所作所为及其警察暴力的恐怖、疯狂的流放、监狱、苦役、要塞和每天不断的绞刑，正越来越强大。

这种行为为斯杰潘·拉辛开脱了最后一点道义上的拘束，“既然有学问的老爷都这样做，那么我们也是上帝的吩咐。”他们这样说和这样想。

我常常收到这类人，主要是流放犯的信，他们知道我写过一些关于不要用暴力抗恶的文字，尽管他们多半是不识字的人，却都强烈反对我的意见。他们说，政府和有钱人对人民所做的一切，只有用一个词来回答：复仇、复仇、复仇。

我们的政府盲目得出奇，政府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只在解除自己敌人武装所做的一切，只会增加他们的武器与他们的毅力。是的，这些人是可怕的，不论对政府，对有钱人和生活在有钱人里的人来说，都是可怕的。

不过，除了这些人所引起的恐怖感外，也还有另外一种感情，一种比恐怖感更大的必须有的感情，这种感情我们大家在对待那些因为一系列巧然事情而陷入流浪生活的可怕处境的人们时，是不能不感受到的，这种感情就是羞愧感与同情感。

逼使我们这些没有身处其境的人去回答这种无论如何在我国生活中都是新的可怕的现象的，应该主要不是害怕，而是这种羞愧感和同情感。



列斯科夫

拉多加湖上的修士岛

是一个晴朗的炎热天。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市里的空气温暖而柔和，城外的空气当然会更好了。

我们七点多钟来上船，轮船烟囱已经在冒烟了，码头上很挤，售票口又是打开的，可是，现在就连昨天那个大俄罗斯验型的楚赫纳都不在里面。贴着通告，说可以买票，但是如何买，跟谁都问不明白。

这时候铃声响了，十五分钟后，又响了第二遍——真急死人！

不再忙着买票了，索性不买票就提着箱子上船，在相当宽敞的船尾头等舱坐了下来。

没人阻挡我们，也没人问我们凭什么坐在这儿。如果我们有时间观察的话，我们一定会很轻易地注意到，我们坐下来以后，别人也是这样进来的，想坐哪儿就坐哪儿，想怎么坐就怎么坐。可我们实在顾不得观察了，因为我们这一对烟鬼遭了大难：我们把为上路准备的雪茄忘在家里了，身上只有烟盒里装着那几根。



怎么办？不抽，忍着，受罪——这当然比一路把座位让给别人容易得多。但是，魔鬼开始诱惑了：四天不抽——有点太可怕了！——怕是坚持不住的吧。

“实际上不是四天，总共只有两天，”一位陌生人听到我们的交谈，插进来说。他提醒我们，反正在瓦拉姆是不准抽烟的。

“我们每人衣袋里有十根雪茄，两天足够了。”

可是魔鬼在继续诱惑，它悄悄地说：

“不，少了，少了。瓦拉姆岛上虽然不许抽，可是我们也能找个地方藏起来抽两口啊。”

我的旅伴决定下船买烟，就算是里加产的雪茄也行。有人劝他不要去，说在凯克斯戈尔姆，一定能买到上好的瑞典烟。另一个人断定在这时买已经来不及了，而凯克斯戈尔姆的雪茄是不能抽的，因为那种烟“气味难闻极了”。但又有第三者发表一种较为令人欣慰的意见，说凯克斯尔戈姆的雪茄必要时也是抽得的，只不过要站在陡坡上迎着大风抽就不要紧了；再说，即便在这里去买一盒烟，也是来得及的。

“第二遍铃都响过了，”和我同行的画家说。

“那又怎么样？这不能说明什么。”

这时候传来了第三遍铃声。

“听见了吧！”

“没事，没事。大胆地去，还来得及。”

“谢谢啦！船长和舵手已经各就各位了。”

“啊，舵手和船长就位了！怎么搞的，哥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去哪儿了？”

“这个哥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是什么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什么！……您连哥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是谁都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们说出了一个在彼得堡甚至全俄罗斯都很著名的商人的姓氏，但是迄今为止我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能让轮船恭候大驾的重要人物。

“呃，如果哥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还没来，那您就去好了。”有几个人向我的同伴建议，然而他没听他们的话，没去。结果是非常明智的，过了约五分钟，舷梯刷刷地吊起来了，轮桨在水里旋转起来了，我们启航了。

“这么说，哥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来了？”

“那还用说，准是到了，没有他能开船吗？”

“为什么他没来就不能开船？”

“一个发了财的乡巴佬，您知道，我们这儿对这种大财主可敬重着呢。”

“啊，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是修道院的施主，正在谢尔多波利兴建一座教堂。”

“是这么回事啊！他在哪儿呢？”

“那不是，在旮旯里坐着的那个。”

“在哪儿？”

“就在甲板上，那个年纪挺大的，戴着顶旧便帽的。”

这位俄国大资本家这样令人瞩目地不讲究仪表，那种真正的、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的谦逊风度，让我们惊叹不已。

“从来是这样，”一个商人听到我们的话，解释说，“手上有好几百万的大富豪，对酒啊，水果啊等等天生的在行，是从沿街叫卖开始的。对老爷们也肯赊账，可农奴制那时候老爷们有钱，欠了账还是肯还的。他就这样发了家，现在，房产也有



了，轮船也有了，都是靠正经八百的努力得来的，可性情还是那么温顺，不只不要人家尊崇，还挺不喜欢这一套呢，特别地讨厌这些呢。您瞅，总是这样：找个什么角落躲起来，跟普通百姓坐在一起，只不过人们在他面前全都爬着走——何苦呢？老天，恶心死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不要脸而已，没别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自己会看见的。说实话，乘这条船去修道院整个就要你受魔鬼的诱惑。哎哟，呸，呸！这话不吉利！不吉利！呸，呸！还是去上头吧，到轮桨罩子上去吧。”

“那儿有什么？”

“从那儿看好风景啊：河两边马上全部是工厂了，往前是伊若拉，然后要经过浅滩，河水花花地乱翻，好看得很呢！”

“在施吕瑟尔堡，停泊时间长吗？”

“不长，除非哥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要进城办什么事，要不然做完圣母祈祷就开船。到了湖上，那才是好呢！”

“怎么个好法？”

“清爽呗。”

他唾了一口唾沫，驱驱邪气，又划了一遍十字，沿着扶梯爬上船顶值更的位置，在一侧的轮桨罩子上坐下了。这时我们才开始认真观察我们周围的人和环境。

轮船刚刚开足马力，船上的人们就发生了迅速的却有条不紊的流动：各自走向想坐的舱位，纷纷入座。船都开了，票还没人卖。二等舱颇有溢满之患，就像塞满了籽的留种黄瓜。环



境之肮脏，气味之芬芳，也正象这样一种的黄瓜。小吃部设于此，买三等票的乘客想来也可以来，就餐的食堂也设在此。三等票乘客则散坐在整个甲板上，只有衣着确实褴褛不堪的人和乞丐们对靠近其他乘客有所顾忌，因此总是待在前甲板上，把船尾让给比较干净的乘客。意大利乞丐可就不会这么谦逊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女同胞“偶然地”不得不跟一堆乱七八糟的意大利人，包括几个要饭的，共坐一艘不是为载客用的轮船在海上航行。他们的恶臭和“昆虫”从四面朝我们近逼，叫我们无路可逃。再加上，其中更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家伙，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毫无顾忌地把屁股挺到船外大便。干这个的时候，他一只手在后面掀着他那破衣烂衫，另一只手还伸向女士们，求她们给几枚索利多或者一片纸。女士们还觉得这怪别致呢——我国的乞丐没这么别致，不过比较客气而已。他们这种客气应该被大大感谢，要不然的话，我们一路就只好憋在船舱里去体会亨利·海涅的“谁要爱人民，就该首先把它好好洗干净”那句话的合理性了。说实话对此我早有认识，因此，惭愧得很，本人向来是一丝不苟地挑选干净一点的座位，整洁一点的邻居的。

头等统舱这一班次的乘客有下列人物：我第一眼见到的是一个小矮胖子，跟侏儒差不多，皱巴巴的脸像蒸熟的苹果，长着一对灵活的褐色小眼睛。他坐在沙发上，面对入口，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眼镜推在额头上。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本以民用字体印的小册子，但从卷首花饰看来，是修道院的出版物。然而他并没在读书，似乎正在进行神学的思考，目光严肃地审视着每一个刚进来的人的面孔。我马上就认出了这张带着旧教徒的惶恐神气和宗教狂的恶狠表情的怪脸。很久之前就有人指给



我说，这家伙是全俄国最有名的假圣人，而且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假圣人（这一点我将在下面适当的地方说）。和这位不但是头等的而且是古典的朝圣者的座位并排的几张桌边，坐着几个外国人：一个身着灰色上衣，戴着有透气孔的礼帽，夹着单片眼镜的所谓“衣冠楚楚，身体健康”的年轻英国人。他旁边是一个美国佬，真的——一个地道的美国佬，就别提有多地道了——那是一个无论在马萨诸塞还是肯塔基都找不出来的最纯粹的典型：个子不大，墩墩实实，久晒变黑的皮肤，褪了色的被吹得干枯的头发，轻灰色的大眼明显地露出精明干练和几分狡黠，但同时又有一些憨厚和善良的成分。他的礼帽上没有透气孔，却有一只列氏气温表，那是安在裹着帽头的一条宽带子上的；碎斑花呢制作的上衣，用同样料子做的背心。一条金链子挂在背心外面，那么粗，那么重，用我们的眼光看简直有点俗气。金链是用一个结实的钩子挂在背心上头的扣眼里的，但是背心禁不起它的重量，钮扣老被拽开，因此又用一根我国农村常见的彩绦托着钩子，挂在脖子上。彩绦两头没有剪短，在胸前晃荡着。背心虽然被金链吊着，仍是总往上跑，而长裤却总有往下掉的架势，从而两者之间在肚子部位出现了一周所谓的“挑檐”，那是由外露的花衬衫下摆所造成的。在下头，裤腿与极厚的鞋底短靴交接之处，又有两圈一样的“挑檐”，只是颜色不同而已。这个美国人（他已经在喝黑啤酒了）挨着坐的第三位旅行者，是一个能说俄语的年轻英国人，显然是前两个人的翻译和导游。此外便是我和我的友人画家Л君，还有两个携带篮筐的商人，一个偎着靠枕的贵族，一个手提女士衣帽盒的总参谋部军官，一个带有几分犹太人模样的胖得要死的德国人，跟他在一起的是一位体态匀称、线条极佳、一头红



发的年轻女士。这位令全舱乘客尤其我们这位画家注目的女士是这个俄籍德国人的夫人，原籍匈牙利，但在俄国马戏舞台上长大，骑术高超，曾是一名出色的女骑手（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哥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也就是上面说过的那个显要而谦恭的发财摊贩，和同行的建筑师（造教堂的）占用了头等舱里的一个单间。此外，同船的还有几位女护士和世俗的女士，也坐进了特设的妇女客舱。我们这位德国人的匈牙利太太是点缀我们这个男性社会的一个令人愉快的特例。我们刚刚坐好，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就攀谈起来。第一个话题是，许多人对于轮船在瓦拉姆给乘客逗留的时间那么短感到不满意。的确，去那里的轮船每周一次，礼拜五早晨开船，航行一整天，停靠科涅维茨过夜。礼拜六早晨，早祷以后，离开科涅维茨，在凯克斯戈尔姆作短暂停留，当天晚祷前到达瓦拉姆，留下到瓦拉姆的乘客，载着其它的乘客沿着礁岛密布风景如画的北岸驶向谢尔多波利，礼拜天做日祷的时候重返瓦拉姆，这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每个人都要做好回家或是在修道院待一个礼拜的准备。这非常叫人头疼：不是谁都可以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也不是谁都愿意在不习惯的环境里与世隔绝地过八天，可是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为什么渡船就不能给瓦拉姆朝圣者一个完全的礼拜天？”

有人回答说这个做法“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但究竟是根据什么实际，问谁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而且，更叫人头疼的是，除了“瓦拉姆”号，走这航线的还有属于另一个老板的“飞行”号，但这条船的航班也和那条船完全相同，礼拜五从彼得堡启航去瓦拉姆，礼拜一回

航。

“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两条船的航班不能错开？”

回答还是同一句话：“根据实际只能这么做。”

这个“实际”造成的后果就是，虽然去瓦拉姆的人非常多，但是在去过那里的人们中，你遇不见一个能夸耀一下他对该岛的知识和对岛上特殊居民的生活有所了解的人。

这个“实际”实际上安排得确实使你突破不了。在城里，去过瓦拉姆的人，除了一个所谓偶然的小笑话和他“参加过一次日祷还去过尼古拉隐修院”之外，没有人能向我说出其它什么别的，现在，在船上这么多乘客中我也没能遇到任何一个知道更多情况的人。就连那些整礼拜在岛上住着的人，见闻也强不了哪儿去。他们所谈的内容，无非是增加了一些“衲衣僧”发给他们僧袍、他们“执过杂役”以及参加过七次而不是一次日祷一类的事情罢了。

“那么隐修院呢？”我们又问，“那是很值得看的呀。那里可是有好多隐修院呢，有独居修士，苦行修士，静默修士什么的，这些人，难道你们一个也没见到过？”

大部分人回答：“没有见到过”。

“为什么？”

“没有人祝福我们去。”

“哪有这样的事，管他们祝福不祝福呢，这是一些致诚的信徒啊，这可是我们亲爱的明灯啊，有谁不把点亮的明灯放在桌子上头，反而把它隐藏起来呢？这是违背戒律的。”

“违背戒律也罢，不违背也罢，反正在瓦拉姆就是这样做的。到瓦拉姆去，除了大教堂您什么也见不到。”

有的人稍微幸运点儿：对身份较高的人，能赐给稍做参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